

陳魯直

沉思的记录

——从报人到大使

陈鲁直 著



The Meditations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沉思的记录

——从报人到大使

陈鲁直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陈鲁直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8

ISBN 978 - 7 - 5136 - 0854 - 1

I. ①沉… II. ①陈… III. ①外交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4496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张梦初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8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854 - 1/Z · 979

定 价 3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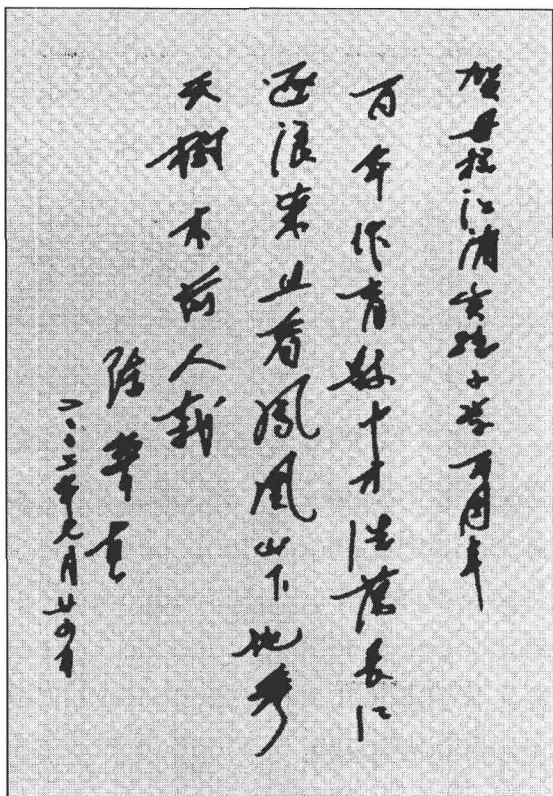
进入 21 世纪的第三年，也就是我 78 岁的那一年，2003 年，我意外地收到家乡南京江浦寄来的一封邀请信，要我参加江浦实验小学成立百周年庆典。该校是我 6 岁起启蒙的地方。1937 年抗战爆发，1938 年我从江浦到上海读中学、大学，1949 年解放。此后的 54 年中我只回过家乡四次，基本上只是做几天的逗留，没再长住，母校也没再回去过。现在欣逢它建校百周年，真是机会难得。所以，2003 年 10 月 25 日，我和老伴成幼殊(她是湖南人，比我还大一岁)都去江浦参加了 26 日举行的庆祝大会。

我的兴奋，原不过是为母校的健在高兴。到了之后，才知道把我列为当过新中国驻外大使的所谓“名校友”之一。看了学校简介，更使我惊喜的是，原来母校的最初创办人，是我的祖父谢则陈(即陈殿弼)，我作为他唯一的孙儿过去竟不知道，只知他是晚清末年封建科举制度最后一期乡试中举的“举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即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此前的最后一次乡试)。

前
言

据《江浦县续志》记载，从1903年按照朝廷的诏告设立了县立小学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我祖父曾是县立小学的副校长、校长；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浦第一届教育会副会长；民国五年（1916年）当了江浦第二届教育会的会长；民国七年（1918年）又当了江浦相当于教育局局长的劝学所所长，^①此后即退下

来。作为“老古董”，不但上升为货真价实的地主，而且成为抽大烟的乡绅。从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看，他不仅是落伍了，而且沦为不合时代需要的保守派。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他当然属于应被革除的一



2003年，陈鲁直先生偕夫人成幼殊女士回家乡参加母校——南京江浦实验小学百年校庆，并题词贺诗

^① 中共江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江浦县续志（教册暂定）》，刻印赠阅版本，1984。[2]2, 3, 11, 14, 31

群。所以，江浦小学虽尊重历史但仍按实记录他的业绩，却没有作什么渲染。

2010年，我已85岁，粗略一算，从1953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已近60年。外交离不开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的内涵，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自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到江浦参加我上过的小学的100周年校庆，就不免要回溯我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因而也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我的教养。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它使我乘机思索一下我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究竟是跟上了时代，还是落后于时代。我特别以时代为核心来回顾我的生平，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代观看自己60年的经历，那就是自以为属进步之列，也是自欺欺人了。在本书开始时，我特地交代一下我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目 录

前 言	1
一、思想变革的发端	1
二、爱国与抗日	8
三、阶级与亲情	22
四、革命与改造	33
五、苏联 ^① 其名及其实	46
六、联合国国际关系	56
七、西欧和东欧	74
八、太平洋能否太平	87
九、资本与全球化	102
十、适应必然性为上	117
后 记	135

① 本文中多处涉及“前苏联”，为便于叙述，均仍以“苏联”称之。

一、思想变革的发端

回想起来,在我祖父“中举”的前后,世界连同中国在内都处于变革时期。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由头。接着,欧洲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而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自此半个多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东方亚洲国家扩张侵略,促使亚洲的分化,出现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的崛起,以及日本首先对中国的侵略,继而以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东亚新时代开始。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促成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历史发展。

马、恩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认识到对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一定误判,是因为忽视了“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①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22]597

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① 这里指的是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事件。而且马克思还说,是英国的大炮推动了这次起义,加速了中国旧体制走向崩溃,而日本则乘机兴起。

1864年,以农民起义为起点的“太平天国”,堕落成比满清政府还要腐败的“天皇”洪秀全统治,最终被满清政府消灭。19世纪后半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阶级起来借助各种社会力量推翻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

我的祖父就是在太平天国的长期战乱中,随他的父母从安徽逃来江浦的。他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但并未随辛亥革命转到荏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他过继给外祖父江浦谢家,改名谢则陈。直到他退出公职,才恢复本名陈殿弼。我的父亲陈兆华,大概生于1904年,其时我祖父已30多岁。我则出生于1925年,父母都在20岁左右。大概4岁时我祖父去世,过了两三年,即1931年,我父亲也因伤寒病亡故,我成了陈门独生子,列入陈家“荣”字辈,名陈荣绂(音伏),靠寡母抚养。家里还有一人就是祖母,一家三口,担子都落在寡母肩上。

我对祖父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对父亲,也只依稀记得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2]1

一个轮廓,知道他是一个“纨绔子弟”。祖父还有三个女儿,都比我父亲大。大姑母嫁给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二姑母、三姑母倒嫁给江浦人,但和南京的姐姐一样,都得靠娘家支持。所以,我的寡母唯一的依靠就是她的娘家许家,具体来说就是江浦的名中医“许二太爷”。“许二太爷”就是我的外祖父。许家是江浦大户,家大族大,我的母亲是他的二女儿。当然,经济上母亲无须外祖父支持,但社会地位上,在她成为寡妇后,就不能脱离外祖父和娘家的支撑。我母亲虽然小时候就变成“解放脚”(即双脚未完全裹小),但男尊女卑,妻子是丈夫的附庸,丈夫有三长两短妻子都难辞其咎,这些封建传统意识和习俗的影响,对她还是天经地义的。我母亲嫁到陈家,公公丈夫接连死去,这就是典型的“克父”、“克夫”的“恶命”,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我的祖父、父亲相继故去,我母亲的精神负担就极其沉重。轻年丧偶,本已不幸,现在更好像自己不能见容于社会,也就是“见不得人”。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母亲自丈夫死后,决不轻易到公共场所。江浦那么一个小县城,她是决不在大街上露面的,连去外祖父家,从南门大街到北门大街,也得走后街。陪伴她走后街就往往成为我的任务。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难以理解母亲的心理。有一点是我已经感觉到的,那就是有名的“举人之家”居然衰落到如此地步,它的一家之主的主妇似乎连做人的社会地位也丧失了。我的母亲究竟有何罪孽,受此煎熬呢?

俗话说“家道中落”，这是常见的。难道我父亲短命而亡，竟然使他的配偶也坠入如此“难堪”的惨状了吗？

我自小引以为骄傲的，是祖父的发迹出于他自己的努力。就在我祖父、父亲逝世之后，我幼小的心灵仍然以祖父的苦学成才感到无比自豪。在江浦南门外谢家的对面有一个小土地祠，那是我祖父从小苦读的地方，在江浦是颇为有名的。直到去上海上中学，我还是不时探访祖父发迹的“圣地”，但它终于毁于水灾，成为陈门衰败的标志之一。

我祖父在科考制度下，转向读书，直到成为江浦为数很少的末代举人。恰逢戊戌维新和民国革命，他被卷入了中国学制改革的大潮，一时成了县里教育界的名人。但“辛亥革命”开创的局面，很快就由“变革”陷于停滞。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列强间的争夺，不但阻止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步伐，并且成为东方革命的障碍。

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太平天国不能脱离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失败结局。弱小的资产阶级依靠封建军阀推翻帝制，却难以与顽固的封建势力较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从世界范围上来讲，已是没落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虽然有给以扶持的一面，但却处处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设置障碍，甚至支持中国维持封建帝制。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极其奇特的复杂性。

在这个时代，我的祖父竟然从新学改革的参与者沦为落伍者，从地主阶级的新成员变成守旧者，环境的因素造成他的家道中落，他个人的苦处就是在新旧交替中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前面说过，由于父亲的死，我的母亲成了陈家的“克星”。母亲以孤儿寡母的地位支撑着陈家，是很不容易的。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我童稚的心。稍大一些，我开始痛恨这种给人的精神造成压迫和摧残的制度和文化，这就启动了我的寻求变革之念。

本来，江浦县南门大街“谢则陈”的家作为新举人的住处已经“焕然一新”。一座里外三进三开间的大砖瓦结构，前后院两个大园子，中间还有个天井。前院有一棵大香椿树，后院是食用的水井和厨房。人口不多的祖父有这么大的住宅，自然表明他的地位上升。

1928年蒋介石掌握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后，陈家发生了大变故：我的祖父去世了。照传统，家主故世全家穿白，所以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江浦南门陈家似乎都是淹没在一片白色里。我祖父死后，我父亲接着病亡。而死去的家主遗体入殓后，置于棺中在家里要留放至少7天，即所谓“头七”，才出殡下葬。隆重者要留放更多时间，最多可达3个月。我的祖父、父亲留放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但这一全过程的基本色调就是白色。正因为如此，白色在我的感觉中就是不祥，就是悲苦，老是伴随着泪水。总的来说，母亲就是这种气氛的化身。因此，我一想

起童年,就产生一种力图挣脱的压抑感。一般儿童都以童年为乐事,我对童年却总是乐不起来。变革是我“心向往之”的,我估计我母亲也会有这种想法,只是她面前没有变革之路。

我还隐约记得陈家前院左边的住房曾是我父亲“小老婆”的住处,后来她竟席卷财物逃跑了。我母亲根本无可奈何。随着我父亲的死,前院的左右住房都空了出来。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只需中院左边的住房,前院的住房就由我母亲让纽姓亲戚住了。这家亲戚是我母系的关系,还长我母亲一辈,我叫他们夫妇为公公婆婆。纽家公公婆婆的进住,使整个院落增加了生气。

但纽公公的境遇竟也越来越落魄,以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丧失工作能力。我只能归罪于江浦南门的陈家有问题,起码是“风水”不好。如此的旧观念,对我来说是本不可理解的,但却又视为一种解释。我还记得纽家公公



少年时代的作者

几次在院子里仰天长啸,好像要吐出无比的悲愤,令人吃惊。我不禁有凄凉之感,深为同情。所以,“风水”之论油然而来了。在忙完我父亲的丧事后,整个的环境仍然改进有限,再加上母亲所经受的不公正遭遇,就使我的变革之想逐渐迫切起来。

不过,这种变革的迫切感就一家而论,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进了小学之后,“家恨”加上“国仇”,这才打开了我的眼界,进而探求我母亲不幸的真正原因了。这是我的母亲所不能轻易获得的,但她仍按常规送我上学,并没有像有些老顽固把独生子拴在身边,或者把老师请到家里来,专门为她的“宝贝儿子”授课。这恐怕是受我外祖父家的影响了,因为我母亲还是听她娘家的新派哥哥们的话的。

就时代观而论,确实在同一时期,由于所处境地不同,区别可以是很大的。以我父亲为例,我祖父死后,由于上海舅父的推动,曾去上海上大学,但除了找了一个小老婆外,没有什么长进。当然,这只能怪他自己,不能说是上海舅父的过错。我母亲心里自然有数:她绝不说是她的哥哥们的“过错”,只是她的丈夫不学好,自己的“命薄”。

记得在我之后,我母亲还生过一个小儿子,但不到两岁就夭折了。这不仅证明母亲的“命狠”,而且把我也牵扯进去,表明我的“命毒”,容不得一个弟弟。难道真的如此吗?

二、爱国与抗日

1931年，即我6岁的那一年，母亲让我上江浦小学。小学在江浦东门城内。说它是城，江浦倒的确有一道环城的城墙，周围虽不过两三公里，却是明代就建造的，在历史上也算是有名的。例如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陷落时，曾是清军江北大营驻地之一的江浦，是李秀成和曾国荃的争战之要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江浦的攻坚战就是渡江成功的关键。至今江浦凤凰山还有解放战争烈士纪念塔。

江浦东门正与我家所在的南门形成一个L形，步行只需一刻钟。我母亲毕竟还算“开通”，让我自己来回走着上学，不必别人伴送。学校就在凤凰山山脚下。校舍前后有三排，紧靠城墙一边，在它的左边是一个大操场，贴近“文庙”，俗称“孔子庙”。从“孔子庙”到东门城墙，背靠凤凰山，可说就是学校的“全景”了。

我对于上学并无太大热情，虽然摆脱家里的压抑气氛是我企盼的，但作为一个独生子，又带着特有的难以合群的孤僻，所以对课堂学习我并无好感。我倒倾向于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验小学校舍

行其是。家里有的是祖父留存的书籍,大概从五岁起,它就成为我乐于涉猎的天地,但由于缺乏指导,反养成一种好高骛远的习性。在父亲去世之后,我自己也感到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还是坚持下去了。

从 1931 年我上学,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在我思想成长的历程中是一个完整的阶段。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它使我接触到新意识,那就是爱国主义。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究竟反共与抗日是一种什么关系,当时我知之甚少。但当时备战的举动和气氛倒是刺激了学生。学校里有了军训式的童子军训练,学生自然感到新鲜。到 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前,江浦设了驻防部队,有一个团的正规兵力,学校的操场成了部队出操活动的场所,给学校生活增添了新因素。“西安事变”扣

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学生很受震动。在为蒋介石担心的同时，更激起抗日的爱国主义热情。本来，由于东北三省的丧失，学生对日本就有了敌忾。很明显，中国是遭到欺压的，小小的日本究竟算什么呢？

就世界形势而言，进入 20 世纪后，欧洲的经济的发展还没有由“自上而下”的革命（资产阶级巩固其民族国家的行动）变成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之间的鏖战。19 世纪中期，法德两国在亚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兼并与反兼并斗争，激起疯狂的军备竞赛，在恩格斯的笔下还不能算是两者发展阶段上的角逐，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各自的民族国家要求。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对于这两国的工人阶级倒反而成了新的联系纽带。^① 这种沙文主义是为德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服务的，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根据，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从德国资产阶级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中得到真正的好处。

“沙文主义”一词的来源是，拿破仑手下有一个叫沙文的士兵，对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的政策盲目狂热崇拜，自以为优越而鄙视其他民族；后来这个词被广泛应用，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成为狭隘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此时，西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也发生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600